

夯实基础，加强方志学学科建设

蒲 霞

地方志的发展日渐成熟，积累了丰富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地方志编修和修志人才培养上都有着相应的理论总结和实践经验，这些不仅是中国地方志发展状态的反映，也是今后方志学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新时代加强方志学学科建设，必须以前人积累的成果为基础，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从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四个方面进行建设。

一 学科理论建设

历代学者总结的方志理论总体上可以分为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两大体系，前者主要包括地方志的概念、性质、特征、起源、功能等，后者则主要涉及地方志的编修原则、编修方法以及方志人才培养等。时至今日，这些理论依然是方志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

在总结方志概念的同时，前人学者也指明了地方志的内容。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指出：“凡其兴废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考诸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编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① 地方志是“博物之书”，应该尽可能全面地收录一个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方方面面的情况，成为这个地区的“全史”。地方志内容的丰富性是其价值的基本保证，因而新时代编修地方志依然要坚持这一理论和原则，以丰富的内容进一步提升地方志的价值和生命力，方志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便有了坚实的基础。

古今学者认为地方性和时代性是地方志的两大特点，地方性主要是彰显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的不同，反映历史发展空间上的差异性，而时代性则是突出历史发展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反映历史发展时间上的差异性。历代编修的地方志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充分考虑。比如，徽州大儒朱熹祖籍婺源，嘉靖《徽州府志》首创“朱子世家”，即“朱子集诸儒大成道统攸属，仿孔子作世家”。^② 康熙《徽州府志》继承了“朱子世家”的设置，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拓展和完善，展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③ 如何保持地方性和时代性这两个特色，也是当今方志编修需要继承和注意的。新时代社会发展有了新内容，但如果地方志编修只是一味追求地方性和时代性而随意增减类目，却不考虑是否符合方志编修的总原则和地区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不仅不能增强方志的价值，还会使方志内容繁杂，降低方志的价值和利用率。

在长期的修志实践过程中，学者们注重总结方志编修理论，从方志的体例、内容、类目、结构、编修原则等方面对方志质量的优劣进行评论，总结其利弊得失，希望以此提高志书的质量。比如，明洪武年间朱同在《新安志》“序”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志书质量、如何修志等问题的看法。^④ 朱同认为罗愿编修的《新安志》“博考遗书，网罗众说”“巨细兼该，纲目备举”，是一部

① 司马光撰：《温国文正公文集》卷65，《中华再造善本》本，北京图书馆，2004年，第28册，第12页。

② 参见嘉靖《徽州府志》，《凡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③ 参见康熙《徽州府志》卷12《人物志·朱子世家》，“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82年。

④ 参见弘治《徽州府志》卷11《词翰一·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非常优秀的地方志书。关于修志的方法和原则，朱同认为内容丰富翔实、资料考证精当、容纳各家之说是一部优秀方志所应具备的基本质量要求。朱同对修志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不仅要继承前志的优秀成果，对前志还要“变而通之”，希望编修出来的志书“可以为不刊之典，成一代之言”。为了修好此志，朱同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错综比事，芟繁摭逸，旁搜总括”，最终完成了这部纲目体志书的编修。在修志过程中，朱同一直坚持继承、变通、创新的基本原则。

清雍正时方苞被委任为《大清一统志》编修总裁，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①中对修志原则做了说明和阐释：体例必须统一；由博返约，提倡简明扼要；群书互参，避免志书内容疏漏；强调资料的可靠性。这些原则对于提高志书编修质量有积极指导意义。

二 研究方法建设

校勘、考证、辑佚等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古代学者在编修和研究地方志时常常使用，对地方志收录的资料进行校勘和考证，保证方志资料的准确性，并利用存世的文献对已经亡佚的地方志进行辑佚，从而最大限度地恢复辑志的基本面貌。这些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地方志的质量，提高地方志的价值，也能够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地方志发展的历程，增强对地方志的认识。这些史学研究方法能够加深和拓展方志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助于方志学的发展。

方志学研究可以利用比较方法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了解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时期方志编修的不同特点和价值，从而加深方志研究。历史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从地方志的整个发展历程加深对地方志的认识和了解，并进一步充分利用地方志收录的内容进行相关研究。

史学研究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统一体，获得相应的研究成果，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地方志作为一个系统也可以充分利用系统分析方法，对相应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完善方志研究。

史学研究的方法非常丰富，方志学研究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将这些研究方法引入自身的研究中，从而推动本学科发展。

三 人才培养建设

关于“史才”的素质，历代学者已有相关论述。刘知幾提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②三者以“史识”最为重要，又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清代章学诚认为“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要成为一名良史，关键在于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指作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要史家持心合于理，合于“大道之公”，而不被私欲所蒙蔽。^③对于“史才”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于“志才”的要求，是培养方志人才的基本准则。

对于什么样的人能参与修志，什么样的人能够修出好志，历代方志编修者也有所总结。南宋罗愿指出，如果只是想通过抄录计簿和其他文献记载来编修地方志书，根本不需要那些具有较高学识和能力的人，只要从官吏中选出“善书者”即可完成修志任务，但要编修出质量上乘的地方志书，则“必使涉于学者纂之”。^④关于修志人员素质的问题，明弘治年间的汪舜民在总结徽

① 参见方苞：《方望溪全集》卷6《书三十二首》，中国书店，1991年，第89-90页。

② 《旧唐书》卷120《列传第五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③ 参见章学诚撰：《文史通义》，《内篇五》，民国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④ 参见淳熙《新安志》，《罗愿序》，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州府志编修源流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只有知识广博、远见卓识、善于取舍、不为旁议所迁就的人才能够胜任修志工作，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修出垂之不朽的优秀地方志书。^① 修志人员的素质决定着地方志书的质量高低。

志才培养是方志学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志才培养可以依照史才培养的标准，再结合方志学自身的特点加以完善。

四 服务社会建设

因逐渐认识到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等方面的作用，历代一直重视加强和完善地方志的编修，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方志学也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清康熙年间黄云企曾言：“志犹史也，疆域以之区分，山川以之奠丽，户口、民物、土田、贡赋与夫政事、文章、经术、吏治咸以之察盛衰，考兴替焉。”^② 查阅方志可知一地发展情况，黄云企用“如水之有泉源，如木之有根茎”来说明地方志对于为政之人、为政之道的意义。

林瀚在弘治《徽州府志》“序”中言道：“徽素为文献之邦，文献所存，郡志所存也……惟夫郡有志，一郡之文献系焉……则后千百载无复文献不足之叹矣。”^③ 认为只有文献流传，某一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够被保存下来。地方志著录文献、保存文献记载的作用非常重要。

叶相在正德《黟县志》“序”中指出，方志不仅专门记载一个地区山川面貌、古今沿革情况，对于文人学者、名宦官吏、名人贤哲、忠义之士、贞洁女子等人物及其行为的记载，更能够“激顽懦、风后进”，激发徽州人的心气，方志在“教化”方面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④

清康熙年间的廖腾焯认为，方志中记载的山川、星象、食货、物产、风俗、吏治、师儒、选举、人物等内容各有其价值，可以为读者提供具体而微的参考，而这些内容统合在一起，又使方志有了宏观的特点和综合的价值。使用者可各取所需，充分挖掘方志在不同层面上的价值。^⑤

新时代地方志的编修继续秉承传统，充分发挥了地方志在“资政”“存史”“教化”等方面的作用。在各方面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在继续发挥地方志三大传统作用的基础上，还可以将地方志记载的内容和某些事业的建设有机结合，推动其进一步发展。比如，地方志收录的内容可以为旅游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地方志将旅游地历史文化以文字的形式汇集起来，成为承载该地区历史文化的一种载体，旅游从业者在引导旅游者游览的过程中，以旅游资源为依托，将旅游地的历史文化与具体的物质载体相联系，向旅游者介绍该地区历史文化的相关内容，从而实现旅游者—旅游资源—旅游地历史文化三者的联系。地方志功能的强化以及充分发挥，不仅可以增强地方志的生命力，也可以进一步提升方志学的学科地位，有利于方志学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① 参见弘治《徽州府志》，《汪舜民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② 康熙《休宁县志》，《黄云企序》，“中国方志丛书”，第47页。

③ 林瀚：《林瀚序》，弘治《徽州府志》卷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64年。

④ 参见嘉庆《黟县志》卷16《艺文·志原》，《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⑤ 参见康熙《休宁县志》，《廖腾焯序》，“中国方志丛书”。

地方志资源对高校产学研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实践路径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董馨

新世纪以来,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振兴进行嵌入式互动,各项工作较之从前更有生命力和时代感,也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和经济意义。在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高校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高校的产学研体系与地方志资源深度耦合,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互动发展已成为一个新趋势。本文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拟从地方志资源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产学研的积极意义和实践路径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深入探讨地方志资源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领域的特殊作用,希望形成管窥之见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 地方志资源与高校产学研双向互动的积极意义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是中国的国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之一。”^①从事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崇高事业,其对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思想衍变意义。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的首要意义就是要有思想境界,要有品质、胸怀和格局,树立大方志的观念,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抢救、整理、修缮和保护工作,建立并完善地方志资源的信息化平台,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受众群体,让受众群体感受地方志资源背后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古人思想文化水平。

二是学术示范意义。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需要学术素养和学术思想作基础的复杂性工作,需要从业人员耐心细致并富有创见的开发利用。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加强人文湾区建设,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加强香山文化的建设,香山文化的建设在高校呈现了势强的趋势,关于香山的历史文化资料特别是地方志资源得到高校师生的关注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是文化传承意义。地方志资源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涉及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物产、民风民俗、名胜古迹、知名人物等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地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高校产学研体系把地方志资源吸收加以利用不失为一种创新之举。对推动地方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实践引领意义。高校产学研体系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就是发挥平台作用并付诸实践。高校产学研体系可以较好地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人力,并借助信息化手段形成一个强大的集聚平台和

* 本文为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课题(项目编号:2020GXJK186)中期成果。

① 吴建雍:《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构建现代方志新学说——评〈中国现代方志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

研究矩阵,具有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

高校产学研体系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扎实实践是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的一个内在驱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校产学研平台站在学术前沿,具有先进的理念和研究动力,高校的学者、师生是地方志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要群体,同时也是地方志文化的重要学习者和传播者,对推动地方志文化建设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二是高校产学研平台是党领导下的重要组织力量,其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有针对性,研究领域广泛而科学,研究效率和作用能够起到引领示范,对加强地方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三是高校产学研平台是一个重要的人才培养平台,在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具有人才优势,高校不乏热爱传统文化,有志于地方志资源术业专攻的师生,无论是专业团队的规模,还是专业团队的素养,高校产学研平台均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有的高校开设的学科如历史学、历史文献学、方志学、旅游学等,或多或少都涉及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因而地方志资源与高校产学研体系互动与耦合必将产生出新的文化产品,并形成规模开发和综合利用。

二 地方志资源与高校产学研双向互动的实践路径

当前,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离不开信息化和大数据,信息化和大数据作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是推动地方志资源和高校产学研深度耦合的重要抓手和载体。双方的互动必须基于信息化的实践路径,才能提升合作的质量和水平。笔者认为地方志资源对高校产学研发展的实践路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 利用地方志资源培育学科优势

地方志资源是一种重要的地域资源,高校的产学研首先要对地方志资源进行历史、科学和学术的深入研究并进行学科构建,培育地方高校的学科优势。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进者,其早年的留学和革命经历,特别是辛亥革命实践,对弘扬香山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唐廷枢、郑观应等清末洋务运动的香山商帮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表现,使得香山文化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打上了“香山烙印”。这种地域文化的积淀以及海内外的文化互动,使得香山文化成为广府文化重要的子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欧美高校具有深厚的基础。今天高校产学研对香山文化进行再挖掘的时候,不可脱离的一种基础资料就是香山地方志资源。中山大学、澳门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借助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弘扬香山文化的同时,积极探索文化的根源,把文化寻根纳入产学研。这种文化寻根行为推动了地方志资源研究,也对地区高校的产学研资源进行了再整合并培育了新的学科优势,诸如香山文化研究、广州大典谱写等方面均有所体现。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高校产学研体系有必要依托地域资源进行全面架构,特别是旅游、酒店、商务、贸易等学科的构建,有必要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加强学术之间的交流互动,唯有如此才能赋予学科新的生命力和发展动力。

(二) 利用地方志资源进行地情研究

地方志资源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地情研究,古人对地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物产和民俗方面。

物产在方志中是与风俗并重的必记内容,被称为方志起源的《禹贡》《山海经》中就已有了对物产的记载。《禹贡》涵盖九州,记载万物,开启地方志记载民俗、物产等内容的重要传统。地方志记载风俗始于《山海经》,旧志中多设有风俗志(或称风土、民风、礼俗、土俗),反映一方人民的古今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地方志关于民俗的记载,是研究民俗文化的重要资料。

“文化的基础是民间文化，亦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根文化，是文化的土壤和乳娘，是特色文化的源泉。”^①从珠三角经济带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南粤大地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岭南文化等文化资源均具有地域性特点，即便如香山文化等子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地域特点，背后所依托的是强大的地方志资源。新时代工业化进程，创新发展成为这片土地的新特点，然而文化的力量往往体现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很多风俗习惯其实只是古人生活传统的延续。在传统与现代习俗之间的权衡与取舍，是人文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没有文化底蕴，现代也难免肤浅，没有现代引领，传统也难免僵化。避免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就要深入研究地情，在地情资料再挖掘、再利用的同时作出文化创新的正确选择。新时代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是深圳文化，深圳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成功案例，在城市建设与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过程中没有忽视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一点体现在国企改革、深圳大学创办等具体实践之中。对地方志资源的重视，对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的重视，体现了深圳市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岭南文化的一种折射。

（三）利用地方志资源进行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历代方志大都将山水、名胜、古迹等内容作为记述的重点，有人还把地方志归入“地理书”的范畴，这不能说没有理论依据。地方志从宋代基本成熟定型，直到清代，所记载门类大多是建置、舆图、疆域、山川、名胜、物产、赋役、风俗、职官、人物、金石、艺文等。最近一段时期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海内外掀起一股香山文化热，中山、珠海、澳门等地的大学借助香山文化热，积极整理并出版香山史料并保护相关文化遗产，发挥了高校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特有的作用。近代以来，珠三角地区作为开眼看世界的前沿阵地，产生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志特色的启蒙书籍，有志者利用地方志资源进行思想启蒙，对后来的资本主义思想早期萌芽和革命文化思想诞生起到了助推作用。由此可见，保护文化遗产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再造多么重要。据此而言，无论是地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是高校产学研体系的文化遗产保护，均不能背离地方志资源的基础性研究。珠江三角地带是古越国文明的发祥地，也是近代革命文化的兴起地，无论是传统的地方志资源，还是创新的地方志资源，在这里均能找到典型案例。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建设势强，保护文化遗产成为提升人文内涵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加强地方志资源研究，特别是文化遗产的研究，不失为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

（四）利用地方志资源推动高校实践基地建设

地方志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加强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地方政府推动区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实作基地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在高校实作基地建设中，校企之间的合作会因为高技能的实用人才培养而得到升华。地方志资源的管理部门、研究部门特别是高校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和能力之上。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之于《广州大典》的编纂工作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对树立广州形象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不失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建设。《广州大典》的成功案例对于相关高校的产学研领域的促动、影响和启示是，高校实作基地建设是地方志资源开发和利用不可忽视的领域，也是一个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传统的地方志资源开发和利用借助信息化平台和文化工程建设，能够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志资源开发和利用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挖掘，较之广州，潮州、

^① 柳成栋：《地方志与民俗文化》，《沧桑》2012年第4期。

惠州、梅州等地依然可以参照《广州大典》的模式，进一步挖掘区域内的地方志资源，推动地方与高校互动，加强区域内高校的实作基地建设，培养大量的实用人才。一方面推动地方志资源对高校产学研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形象重塑。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把产学研建设与地方志资源开发深度耦合，发挥高校的专业优势和地方政府部门的资源优势，在推动地方志编纂、地方志资源信息化、旅游开发、文化资源利用、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多领域进行互动合作，形成保护地方志资源的新模式，形成高校产学研体系建设的新路径。在地方政府的战略发展规划中用足地方志资源，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保障。

结 论

地方志资源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积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毋庸置疑，但是文化水平是否与经济水平相匹配，则很难有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其文化建设尤为重要，唯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其发展质量和水平才能得到中肯的评价和认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文化力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也能在地方志资源利用和开发中得到体现，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客观地说，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群众对文化的需求，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需求相对多元化并且良莠不分，因而保持文化的根脉和底蕴显得尤其重要。地方志资源背后的传统文化如何再发掘再利用并成为有生命力的文化，将是地方志资源与高校产学研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此而言，无论是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是高校产学研体系对地方志资源的吸纳，都是任重道远的过程，有必要统筹在地方政府文化工程建设的范畴，加强组织领导，协同推进，为区域文化增强一种重要的底色，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的一个新亮点。

（作者单位：珠海科技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